

此间 | 那些黑夜里的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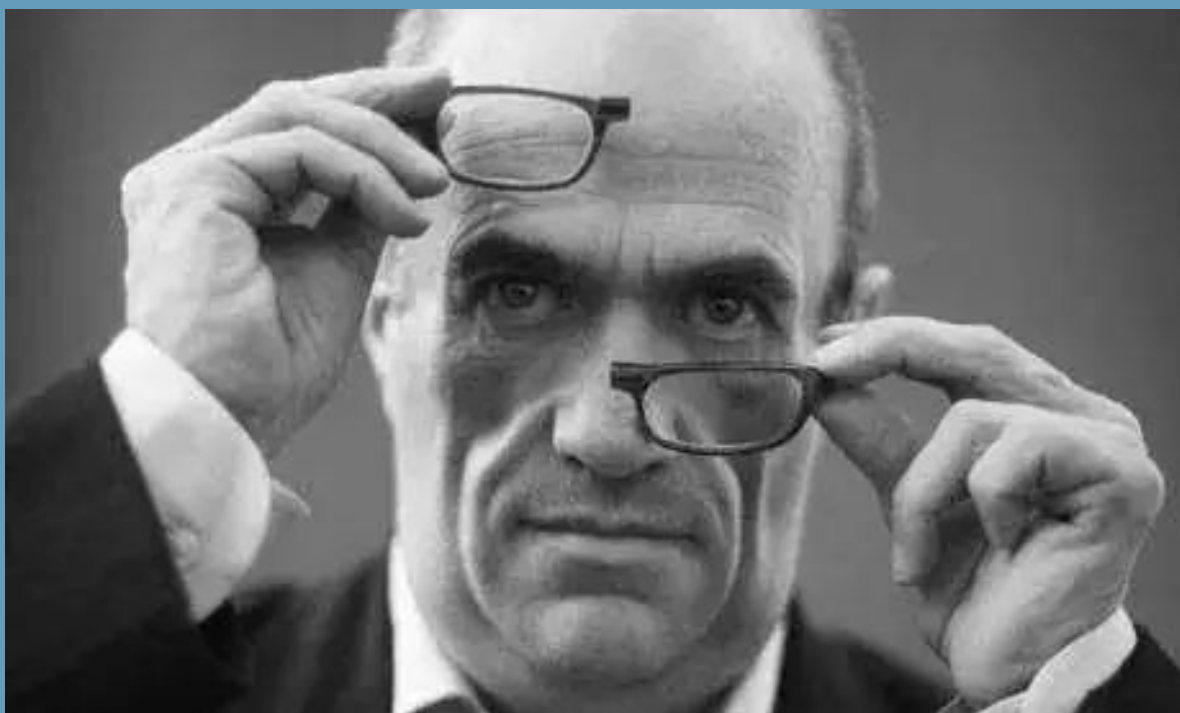
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20-05-27





科尔姆·托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你喜欢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又对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电影感兴趣，那么大约会同我一般被一本书的标题所吸引——《**黑暗时代的爱：从王尔德到阿莫多瓦**》。该书为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短篇人物评论合集，关于同性恋作家和艺术家的私生活揭秘与作品解读，从十九世纪末的王尔德到二十世纪末的阿莫多瓦，以详实的材料、清晰的逻辑、动人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剖析这些传主的创作与时代及自我的关系，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各个时代中经历着从被惩罚到被宽容的历史时刻，这些交织着歧视、欺骗、恐惧、挣扎、疾病等等的时刻即同性恋的黑暗时代，而他们则是黑夜里的星辰，至今仍熠熠生辉。



科尔姆·托宾

托宾本身亦是一位同性恋者，起初不敢在作品中直面自己的性取向，因为会涉及到“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然而在受《伦敦书评》之邀为诸位同性恋作家作品写评论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相比用作品“为读者释疑解惑，为同性恋者铺平道路”的当代作家们，托宾显然对更早期的一些留下模糊遗产的作家兴趣更浓：“他们或因同性恋而深受痛苦（奥斯卡·王尔德、罗杰·凯斯门特），或对此敏感不安（托马斯·曼、伊丽莎白·毕肖普），或让性取向滋养而非主导其作品（詹姆斯·鲍德温），或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弗兰西斯·培根、佩德罗·阿莫多瓦），或在艾滋病灾难中写下挽歌和回忆录（汤姆·冈恩、马克·多蒂）。”当然，我很好奇，为何托宾没有提及一样有过同性恋情的毛姆和伍尔夫，难道是因为相关研究论述已多如过江之鲫？

同为擅长洞悉人性并解构当事人心理的作家，相比毛姆的刻薄和幽默，托宾下笔则显得克制而有分寸感，且多能提出自己不流于俗、不同于传记的见解。对于王尔德这么一位深情又自私、坚定又脆弱的神经质天才，托宾的字里行间不自觉流露出几分哀婉与同情。理查德·埃尔曼在《王尔德传》里以金钱来衡量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多年感情——“既不执行也不要求性忠诚，金钱就是他们的爱情戳印。”这一厢情愿的论断显然触怒了托宾，于是不惜花费大量笔墨为这段感情“辩诬”：“他们的爱情戳印来自他们对彼此巨大的吸引力，来自他们对彼此的需要，来自在同性恋解放前的年代难以界定和解释却对同性恋体验至关重要的东西……”不仅如此，他甚至搬出了异性恋者的“常态幸福”的一面——情感上的爱恋与肉体欲望的满足二者的合二为一——作为佐证，论述这种“常态幸福”在大多数社会中的大多数同性恋者身上难以实现，而一旦罕见地发生了，“就能产生异常强大的情感力量，由此引发的爱恋大抵是强烈而持久的，哪怕肉体上的吸引力逐渐消失，哪怕这种关系对外界没有意义”。除了王尔德与道格拉斯，托宾将奥登与切斯特·卡尔曼、詹姆斯·梅里尔与大卫·杰克逊也归类于此。



王尔德与道格拉斯

托宾指出传记作品的一大问题在于“牺牲了平常和真实，追求趣味性和戏剧性”。对于弗朗西斯·培根的三部传记，他同样评价不高，认为其不约而同之处在于一种不得不为的叙事手法：若要为任何一个对自己的性取向毫不掩饰的同性恋者作传，

都必须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其糟乱的私生活和戏剧性的人际交往——“培根被描写成一个怪人，他的作品被描写为承载了他暴力而痛苦的童年、他的同性恋取向、他的受虐兴趣，以及他那些坏朋友。他的生活在她们笔下成了传记者对同性恋的想象……他的生活也充满了奔放的逸闻、无度的酗酒，巨大的成功伴随着难以想象的悲剧。”托宾通过大量的资料阅读，发现培根“不是那种青少年期对镜自问‘我为何不正常’的同性恋者”，他似乎也有过许多愉快的时光。而种种新发现，正是撰写这些文章的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托宾认为“同性恋的历史并不单纯，它具有欺骗性，难以捉摸，需要极大的同情和理解”。一些同性恋作者迫于社会环境与公共舆论，无法正视自我，内心深处充满对压力的逃避，并将这种挣扎的痕迹留在了作品里，在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谨慎对待。在托宾的另一部著作《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中，详细评论了另一位同性恋作家约翰·契弗，提出需要把他的日记与其自我厌恶放在历史语境下看待：“这些看法是一个已婚男同性恋会寻常采用的手段，佯称——即便只是作为短暂的喘息——其他同性恋是古怪不正常的，而他只是碰巧喜欢与他们发生关系，借此与那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



美国小说巨匠约翰·契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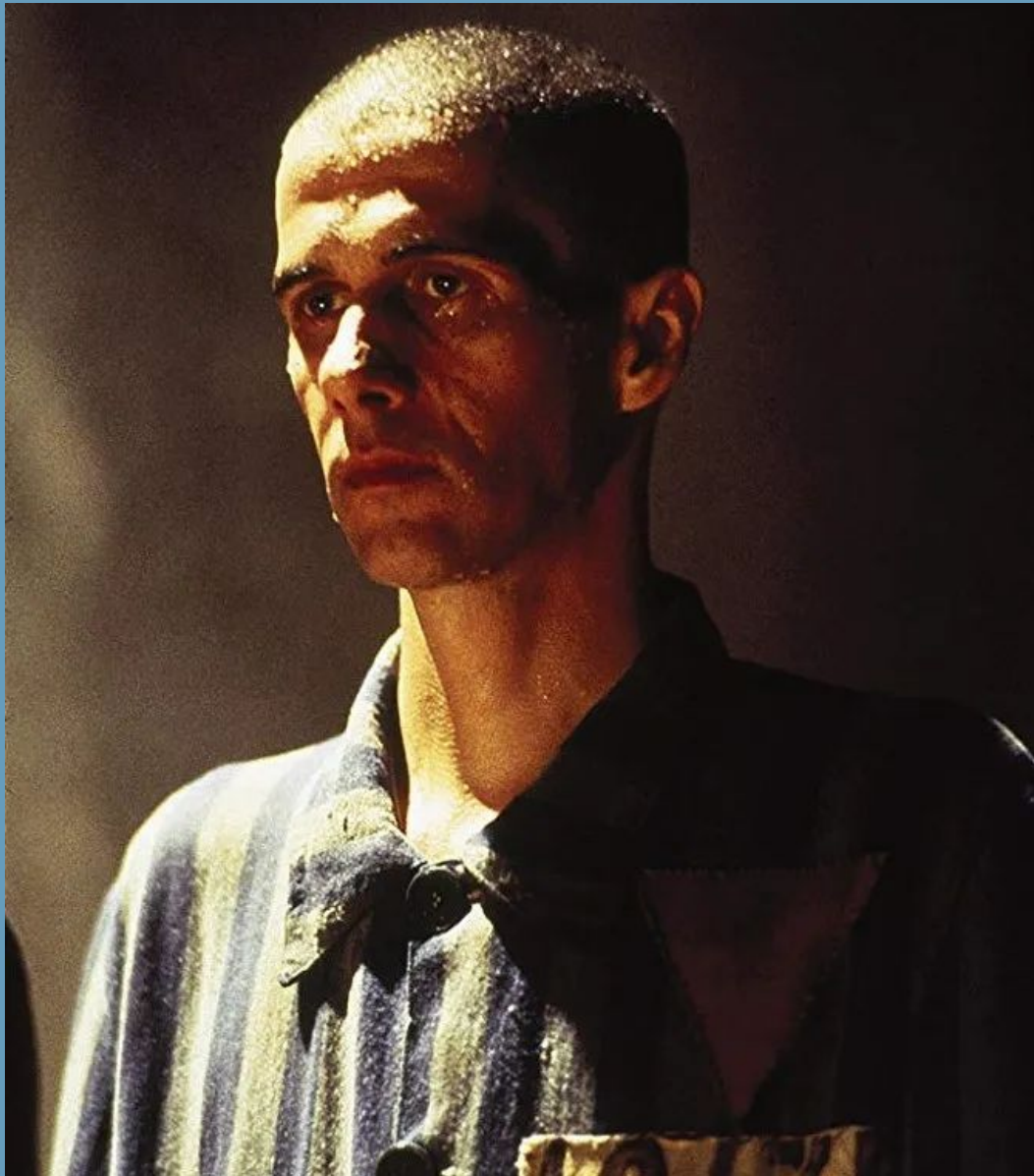
当时社会对性少数的接受度正如福柯所言：“人们能容忍自己看到两个同性恋一起离开，但要是次日他们彼此微笑、牵手、温柔拥抱，他们是无法被原谅的。无法宽容的并不是离开去寻欢作乐这件事，而是幸福地醒来。”

至于探讨这些作家的性取向的原因和意义，托宾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同性恋读者和作者渐趋公开而自信，同性恋政治渐趋稳定而严肃，同性恋历史也成为同性恋身份的重要内容，正如爱尔兰历史之于爱尔兰，犹太历史之于犹太人。这不单单是寻觅历史上同性恋的晦涩踪迹（尽管确实存在），而是寻找某些作家——他们确凿无疑是同性恋，其性取向被大多数批评家、教师所忽视，但对其作品有巨大影响。……异性恋批评家倾向于将同性恋作家写成异性恋，或认为性取向对他们的成就无关紧要。”就像我们熟悉的那首《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在异性恋话语权下被解读为女子对暗恋男子的心声，实际上这是一首男子写给另一男子，即乘船的艄公吟唱给楚王的弟弟鄂君子皙的诗歌。

关于性向身份与创作的关系，托宾一语道破：“从莎士比亚到当代的广告，这个世界充满异性恋的意象，以致无人还会在意，但这些意象潜移默化进了至为隐秘的内心深处。同性恋自我隐藏的部分仍然渴求这类被认可的意象，充分认清这种

意，但这些意象潜移默化地进入了更为隐秘的内心深处。同性恋自我隐藏的部分仍然渴求这未被认可的意象，充分认清这种需求之时，正是当这种需求被满足之时，沉默被打破，这句话说了出来，‘写得很自然，没有丝毫顾虑’。”

在同性恋者身处西方世界而不再大规模遭受困难和歧视、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逐渐于全世界遍地开花的今天，我们可能无法想象过去的同性恋者在历史上的种种行为和态度，无法感知他们所经历的那个黑暗时代。格雷戈里·伍兹在《粉色三角形》中揭露了同性恋者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二战时期当联军“解放”集中营后，那些因同性恋被拘禁而佩戴粉色三角臂章的获救者仍然被当作罪有应得的普通犯罪分子，而粉色三角形也被剔除出大屠杀纪念碑，甚至战后一度没有废除反同性恋法。这一点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情》和《隐藏的恋情》等电影中皆有所体现。因此，托宾才认为“发掘一段历史、一份遗产是每个人的分内事，是通往自由之路或至少是知识之路上的一程，对于不太关心同性恋身份的读者和批评家而言，也具有严肃的意义”。



电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情》中男主胸前佩戴粉红色三角

一系列作家评论的撰写过程也是托宾逐渐面对自身性取向的过程，并帮助他接受一些事情——对神秘的情欲力量和天主教和爱尔兰新教徒的兴趣、对无畏者的敬仰以及对悲哀和悲剧的永恒爱好。而此书也反映了作者对发现许多喜欢的作家原来也是同性恋者的兴奋之情，以及带着新认知探索他们作品与生活的兴趣。碍于篇幅，多数章节浅尝辄止，缺乏深刻探讨，有意犹未尽之憾。倒是每章后面附有作为延伸阅读的书目，可供进一步的知识获取。

在本书最后一章，托宾简单描绘了天主教信仰之于爱尔兰国民生活的意义：天主教不仅是代代流传的信仰，也是塑造爱尔兰社会的基本力量。而出版该书的目的之一，正在于让多数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民不时想起，“被他们长久以来排斥和边缘化的那些人”。其实对于全世界人民，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字 | 三木君

排版 | 盆梁哦